2493
2135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毛澤東與史沫特列談話）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JAN - 7 '52

578-1436 OD

美国作家史沫特列（Smedley）女士於三月一日訪问苏區。在延安府會見毛澤東同志。關於中日问题與西安事变，作如下之談話，玆其要点如下：

史沫特列问：共產党现在执行的統一戰线政策，與你去年秋季跟斯諾（Snow）記者所談的，基本上有無改变？

毛澤東答：如果從基本上說来，是沒有什麼改变的。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統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義，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義，因为日本帝国主義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对；在這個基点上我们願意同這些国家建立友誼的關係。

（二）我们的統一战线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有人說共產党倡導人民陣线，這是不对的。共產党倡導的是

民族陣线，這种民族陣线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线来，範圍廣大得多。

(三)因此，這個抗日的民族陣线之主要政綱，應該包括下面各項：

(1)國内的和平统一；

(2)对日抗战；

(3)人民的民主自由；

(4)南京政府转变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親日派；

(5)國家制度改变為基於普選國会制的民主共和國；

(6)改善人民生活；

(7)發展工商業；

(8)联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

史问：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們準備犧牲到什麼程度？

毛答：這要看看歷史情形。從一九二七年夏天開始，國民党放棄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農工政策。放棄了民族独立與民主自由的政綱。

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並且走向相反的方面。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單独負起中国革命的責任，並採行苏維埃政权與土地革命的政策，與国民党處於对立地位。我們當時採取的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與必要的。但當九一八事変発生後，共産党就発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願在三個条件下與国民党訂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時僅有十九路軍同意我們的主張。南京方面則完全不同意，並且還举行了大規模的围剿。及至華北事變発生，国难已臨極端严重関頭，我們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進一步発表了组织抗日联軍国防政府的宣言，同年十二月発佈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党的決議案，並提出統一战綫的具体綱領。這個新政策宣佈之後，立即得到廣大民众的贊同，国民党不少爱国份子也都贊同了這种政策。這是因為强大敵人站在前面，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

續進行抗日準備，在中国政治上開闢了一個新階段。但是国民党还不願放棄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們又寫給国民党一封長信，堅决要求把敵对的目標，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提出改变国家制度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們痛悔既往，與民更始。我們声明：苏區願意实行與全国一樣的民主制度。這封信獲得了国民党中廣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並沒有回答我們。西安事变爆發，国家處於重大危險前面，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進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們為了鞏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見，當国民党三中全会開会之前夕，乃於二月十日給了国民党一個重要的電報。在電報裡表示了下列各点：

(1)苏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国特区政府，紅軍改為国民革命軍，並受南京政府

共軍事委员会的指導；

(2)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澈底的民主制度；

(3)在全国範圍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針（此种方針，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現在不过重說一遍）；

(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為了消除各界疑慮，取消对立状態，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則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綱領。

史問：你们現在在這裡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則？例如对於商人，知识份子，地主，農民，工人，軍隊等方面的办法。

毛答：对商人的関係，过去與現在沒有什麼差別。我们從来就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紅軍所至，無不保護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帶，红軍不但保護商人，並且連地

主的土地也沒有沒收一象，取得了各界的称讚，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於苏区裡面，商業是完全自由的。

对知識份子的関係，过去與現在也是一貫的保護政策，优待技術人員，文化人員與藝術家，对他们都採取尊重的態度。

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沒收他们的土地。

工人方面，則斟酌情形，実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

对待国民党軍隊的態度问題：任何中国軍隊尤其是有光荣歷史的黄埔軍都应在民族陣线下親密团结，一致抗日。槍口向外，不生内战。红軍與国民党軍隊虽打了十年，但我们絶不記舊恨，願和他们携手偕行，並在統一指揮下，一致為保衛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這些政策，我们都願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見，並把這些附在抗日方針，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條款之

很，一並放進民族陣线的綱領裡面去，以便在全国範囲内实行。

史問：新的統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謂中国共産党人為建立民族陣线，放棄階級闘争，而变成民族主義者？

毛答：如前所述，共産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衛中国，因此必須实現国内和平，取消两個政权的对立状態，否則对日抗戰是不可能的。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從於全体利益，將階級利益服從於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與個人，都應明此大義。共産党人决不將自己观点束縛於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的関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関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階級斗争问題上，我們主張從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的解决此问題：第一，在地主資本家方面，他們是有钱有勢的，首先應當尊重民族利益，对於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極力加以改善。因為地主

資本家如果照舊对工農施行各种慘無人道的压迫與剝削，只顧他们一部分一階級的利益，工農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滅亡。地主資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資本家，都應激發愛国心，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贊成改善工農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決不能只顧自己有飯吃，工農就沒有飯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農就沒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漢奸分子，才不顧大局與民族利益，當此亡国滅种關頭，还向工農盡力的压迫，剝削。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經代表全国工農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為了大局與民族利益，对此應該有滿意的答覆。

第二，在工農貧苦群众方面，他们是無錢無勢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礎，是最大的階級。當此亡国滅种關頭，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樣是抵抗日本，保衛中国，並且他们將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

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後，他们对於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原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的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後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並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史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末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毛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所谓大陆政策与广田三原则，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

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

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自由飞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

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

第七禁止走私。

祗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

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這些條件上談判之可能，日本現在是軍閥政府，這种可能並不存在。

史問：对日作战是否已成為不可避免？

毛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軍閥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無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後，战争的威脅更加緊了一步。

史問：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遠東和平的，你如何答覆這种理論？

毛答：日本軍閥的所謂「遠東和平」，是說日本佔領中国，而中国則不要抵抗，讓其佔領；同中国問題有関係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軍閥需要的所謂「遠東和平」。但是还有一种遠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講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東北四省，撤退駐屯軍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與中国和平地通商，這是另外的一种遠東

和平。但只有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這种和平的，僅只有日本軍閥及其侵略盟友德，意兩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這樣說：我们反対「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贊成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後一种和平。我们主張拿後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為日本軍閥口中的所謂「和平」，只是戰爭的別名，只是使得中国人當奴隸的別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脅的別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極大損害的別名。這种「和平」，據我看來，是应該对他妨碍一下的。

史问：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調和的基点呢？

毛答：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數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軍閥則希望戰爭。這

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針是不能調和的。要解决這一矛盾，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國家與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軍閥服從世界公論；另一方面，如果戰争不能避免的話，中国應該堅决抗战。只有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適應的，同世界調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與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史問：九国公约，凱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等類和平公约，你以為能夠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嗎？在中日戰争中，你以為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義？

毛答：這些条约，在今天看來，確表示着一种和平願望，因此，侵略國家就表示了他们的堅决反对。但這些条约，对於日本這樣的侵略国家，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沒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

意義。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這种条约应該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締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類。祗有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時，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史问：在联合战线政府成立之後，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嗎？或者还须相當的準備時期？

毛答：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進攻中国時，不管在什么時候進攻，中国都应該立起抗战。但我们並不主張向日本挑釁，我们的方針是自衛战。因此，我们應該迅速的切实的從各方面作準備，使中国在任何時候都能够應付事变。我们並不反对準備，但反对所謂「長期準備」，反对準備之名，行妥协之实。

史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現有的資源，財力，是否已足以發動一個勝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財

第八頁

政经济負担？

毛答：没有友軍，中国也是必須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資源與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長期作战的。紅軍的十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証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尋友軍，這是因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處孤立。所以我们主張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這种联合陣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時也是各国互助的。因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禍，也是世界的大禍，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禍一樣。何况這兩個侵略国現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該赶快的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個击破之虞。

史问：在現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這樣一個战争，对日本的经濟，財政，貿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這兩国的帮助下渡过這個战争嗎？

毛答：日本侵略中国，对於日本人民是完全

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後结果，将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這一点，不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資產階級中具有遠見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軍閥，則無論如何也不知道。日本軍閥已经结合了一個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應。他们不但希望用這种方法去渡过向中国侵略的戰爭，而且正準備用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夢當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據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樣完满的。中国人應該有战勝日本的自信心。

史问：共產党為什么主張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毛答：並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產党的政治主張罢了。自從日本侵略開始以来，我们就是願意停止内战的，因為祗有國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個条件下與国民党军協訂立抗

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的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

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送蔣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蔣先生處置西安事变的善後办法，則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許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當西安事变中，日本軍閥方面，寧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說西安事变是共產党的陰謀。這种說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題與国内改革问題上，因政见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後，寧陝对立，於是又有人說：共產党要把西安造成馬德里，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與西班牙的政治環境根本不

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內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內則必須和平。西安事変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經証明他們的話完全是臆測，有些則是悪意的謊話。

央問：許多人不但說西安事変是共產党幹的，而且說在城墻上紅旗高懸，又說紅軍在三原一帶擄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毛答：关於西安插紅旗一類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漢奸看見了罢，可是西安人至今沒有看見。擄掠青年男女的話，也必然是出之於日本人與漢奸之口，這也只有去問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現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說紅軍殺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農村。這些話他們已經說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說一遍。說話的人固然有他說話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現在政府还沒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

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軍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々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說。

史問：外间傳說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於此，你有何意見？

毛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願意這樣說，日本人只願意国共相打，决不贊成這种「屈服投降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軍閥深知共产党採取與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儘管有人說它是「屈服，投降，悔过」，可是实际是給與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個標準，就是民族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民族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檢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動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態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的反对所謂「屈服、投降與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証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

政策了。共產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請他們結束十年來的老政策，轉變到新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政策。這些要求，表現在共產党給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電報中，那就是關於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準備抗戰等々。在這种情况底下，共產党願意改变苏維埃與红軍的名義，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沒有疑義的，共產党的這种步驟，是对国民党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种讓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种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急性。這叫做双方讓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領袖與党員，都是明白這种意義的。但国内有一部份帶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的把我們的這种讓步叫做「屈服投降或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魯迅，在他的一篇小說上，描寫了一個叫做阿Q的人，這個阿Q，在任何時

侯他都是勝利的，别人則都是失敗的。讓他们去說吧，横豎世界上是不少阿Q這類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份患着「左傾幼稚病」的人士，這种人各地都有，槍殺王以哲的那位孫鳴九、就是這類人物的極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於热忱，他们為喪权失地的悲惨歷史而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潔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驗，在大事变中認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與全体，过去與現在，今日與明日的差别與联系。他们開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後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份人，不但对共產党不了解，即对張楊與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進步雖極緩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軍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漲，大多数的領袖與党員是能夠和我们與人民一道從事於抗日救亡的事業的。国民党政策的轉变誠然至今还不滿人意，但是業已開始了他的轉变，

三中全会的决議，可以看作這种開始轉变的証據。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份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份子，同实际卖国的份子—即所謂親日派，区别開來，他们把這二者混而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進份子的責任，在於多方說服暫時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瞭解，以便共同赴敵，這其間需要忍耐性，有時需要退讓一步，只要不違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則可以商量。関於這部份性急的志士们，对於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評奉献他们，至於有些唯求個人與部份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腦後的人们，不管他们是親日派或是口頭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評，也不是僅々諷刺幾句的問題，而是揭破他们的陰謀，使之無法施展其伎俩。

史问：你们对於三民主義的態度如何？

毛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不然我们為什麼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夠

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或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謝覺哉，董維健諸位都是。又有許多人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領導幹部，我們的朱德，周恩來，彭德怀，刘伯承，賀龍，林彪，葉劍英，徐向前諸位都是。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实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這就是說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義，共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主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共我们的現時政綱，並無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這些東西。去年八月致国民党書中，已要求他们恢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誠地為实現三民主義中国而奮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論，亦無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已。至於我们还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

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
並且國民黨員中有許多是信仰資本主義的，
有許多人信仰無政府主義，有些人則信
仰孔子主義，佛法主義，基督主義，無所不
有，也無所不包。祇要當前革命政綱取
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
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
中華民國光明燦爛的前途，實基於此。

第十三頁

哥侖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